

壹、前言

自1919年以降，臺灣教育界的思想發展受一次世界大戰末美國總統Wilson（1858-1924）宣布的「自決宣言」（self-determination）之影響甚鉅，該宣言象徵著國際民族自覺的喚醒（Tsurumi, 1977: 79）。日本大正時期在一次世界大戰後，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與民本主義急速發展的背景下，許多新思想紛紛抬頭與活躍，進而形成大正民主思潮（石川松太郎，1987: 170）。臺灣受日本開放氛圍的影響，1922年文官田建治郎總督執政，發布《新臺灣教育令》，此令明白規定「普及教育」、「廢除差別待遇」、「開放臺日共學」（吳文星，1983: 38-41）。此外，臺灣留學知識分子學習到西洋思想，深知日本對臺灣種種不合理之殖民統治，1919年，先後成立「聲應會」、「啟發會」；1920年，組織「新民會」，發起「撤廢六三法運動」，成立臺灣青年雜誌社，創刊《臺灣青年》；1921年，由林獻堂等人發起，正式成立「臺灣文化協會」（吳文星，1983: 36）。由此可知，1920年代的臺灣，由於文官執政所帶來之民風開化，使得社會狀態處於近代化的萌芽期，而由臺灣人主動創辦的報章媒體與協會，更提供了一種自我啟發與主動吸收新知的來源。

另一方面，當時日本學者較為開放與自由，有不少開明的學者及政治家頗為同情臺灣人之遭遇，常論著批評總督府的種種不當政策，甚至鼓勵或支持臺灣人的文化及民族運動，例如，提倡民本主義的吉野作造（吳文星，1983: 34, 51）。相較於明治時期，此時的日本學者也較為積極移入歐美的教育思想，促使臺、日籍訓導更能對西方近代文明與知識產生關心與共鳴。

在上述的時代背景下，許多歐美教育思想被引進，包括兒童中心學說與Dewey的教育思想，當時，可說是臺灣教育界最興盛的時期（祝若穎，2010, 2011）。除了歐美的自由主義與兒童中心學說外，德國的文化教育學亦傳入日本，並透過日本學者與臺灣留學生將該思想引進臺灣，儼然成為一股潮流，與兒童中心學說相互抗衡。該思想在臺灣發展的脈絡與內涵為何？有哪些思想被移入至臺灣？哪些未獲移入？又有何改變之處？該學說於日治時期與戰後的關係又是如何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。

1920年代以降，當時的世界潮流在臺灣之發展，可參見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佐藤熊治郎，於1922年臺北城南小學校的演講。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將之整理為四篇〈對於現代教育思潮之雜感〉，探討近來興起的教育思潮，包括人格主義、文化主義、民主主義、自由主義、社會的教育主義、公民教育主義與藝術的教育主義，最後佐藤熊治郎指出，「對於臺灣的教育思潮究竟為何，雖然我全然沒有方向，但我想大體推察來看，相信（與日本）是沒有很大的差別」（佐藤熊治郎，1922）。這句話證明了臺灣的教育思潮不僅存在，並與日本相去不遠，同時，也間接說明了影響臺灣教育界的思想亦包括德國的文化教育學。

當時，有些學者也對美國的教育學說提出批評，例如，臺南州斗南公學校訓導伊與部仙松（1929：123）所說：

我國教育界多麼講求感情陶冶與情操主義，但仍以滾滾的美國潮流風靡盛行著。美國學說講求的功利性、理智主義與效率第一，我感到非常厭惡。

這一點，如同德國文化教育學家E. Spranger（1882-1963）批評美國主流的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，認為其哲學的謬誤，就是以外在成功、實利的結果來判斷價值之標準（小塚新一郎譯，1937：30）。換言之，美國教育學說雖可使學生快速感到興趣而產生學習效率，但卻忽略了情意陶冶或人格薰陶等特質。兩種學說各有主張，因此，臺灣教育界在1920年代以後，由兒童中心主義的美國教育思想，以及德國的文化教育學互別苗頭。

研究者整理臺灣教育史或教育類的文獻，發現鮮少有人探究德國文化教育學在臺灣的發展。而劉蔚之（2007a, 2007b, 2008）撰寫的〈跨國知識轉移研究：以中國對德國教育學的接受與轉化（1928-1943）為例〉、〈德國文化教育學在中國的接受與轉化——兼述其在日本的傳播〉與〈複製移植或交融創生？德國教育學在中國與臺灣傳播的歷史回顧（1928-1983）〉，皆由「知識轉移理論」的切入途徑，來探究德國文化教育學傳播至中國，與戰後臺灣的接收、轉化及其影響。文中提及中國在1920至1940年代，對於德國文化教育學之瞭解，主要仍是透過日本與美國等國，這種間接的傳入途徑，對於知識的理解與提升有相當大的限制。而在當時，臺灣同樣也透過日本學者與臺籍菁英來引進學說。日本學者同時